



当代人口较少民族 文学的审美观照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esthetics
about Ethnic Groups with Small Populations

李长中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当代人口较少民族 文学的审美观照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esthetics
about Ethnic Groups with Small Populations

李长中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观照 / 李长中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6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5097 - 7214 - 0

I. ①当… II. ①李… III. ①少数民族文学 - 文学美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①I20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8078 号



著 者 / 李长中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张晓莉 周志静

责任编辑 / 周志静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96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214 - 0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晌，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导论 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研究：问题的提出或合理性	1
第一节 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与其书面文学的发生	5
第二节 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研究现状抑或审美缺失	17
第一章 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口头传统与书面文学创作	26
第一节 民间性：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表征（一）	33
第二节 写文化：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表征（二）	49
第三节 口头传统与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空间转向”	57
第二章 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母语思维与汉语写作	78
第一节 母语思维与人口较少民族汉语文学的“语言”翻译	85
第二节 母语思维与人口较少民族汉语文学的“文化”翻译	100
第三章 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跨文类”书写或文类探索	116
第一节 民族志写作与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身份叙事	125
第二节 “寓言”的民族化书写及其限度	138
第三节 “见证文学”：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创伤叙述	152
第四节 “自传性写作”与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文化自觉	167
第四章 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民间话语资源或“再民间化”	185
第一节 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对民间历史/传统的审美构建	188
第二节 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对民间神话的审美构建	203
第三节 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对民间宗教的审美构建	219

第五章 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空间书写与风景的修辞	234
第一节 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对“空间闯入者”形象的 美学建构	243
第二节 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对“空间景观”的诗意想象	261
结语 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观照：一个必要的视角	280

导论 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研究： 问题的提出或合理性

近些年来，与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相关，“中国经验”“北京共识”等概念应运而生，并一度成为学界竞相讨论的话语镜像。上述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内的直接表述是“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这一宏大叙事命题。加之市场经济或商品化语境下文学及文化生态的持续恶化，“文学经典化”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自然成为上述话语的应有之意。由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不仅限于中国文学能否以及如何经典化的问题，而且涉及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相关话题，引起了文化学、文艺学、中国文学、比较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学者的参与，对“文学经典”何以“祛魅”、如何“赋魅”、何以“经典”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达成诸多共识。不过，在上述讨论中，学界较多关注的是文学的文化生态问题，如出版、消费、生产机制等“外部因素”对“文学经典”的影响等，在文学经典建构与解构等问题上提出的大多是一些既不可证伪也难以证实的“宏大叙事”，过多的“构想”“建议”“设计”等一旦付诸实践层面的操作则可能验证出此类话语的空泛。对如何引导中国文学积极汲取各民族的文学经验，特别是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学经验，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促进中华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建构“中国经典”等这些极富理论生长点和实践引导功能的话题，却没有予以认真对待，制约了“经典”及其相关问题讨论的深度和广度。而这一问题的存在，无疑与研究者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缺失有着密切关联，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少数民族文学书写价值的敞亮。

尽管作为“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民族文学（汉族文学）之间在长期的相互拒斥、碰撞、竞争与互融状态下实际参与了中国文学史的建构或塑造过程，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多元“杂交”状态，并以其充沛的“边缘活力”彰显出中国文学生成的多源性与美学形态的多元性。不过，各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的话语建构及其表述中却一直被作为缺席的他者，长期游离于作为权力话语象征的中国文学史的历史记忆或文化想象之外，中国文学史的这种“傲慢”又以一种“稳定结构”制约着对各边缘民族文学的再发现。即使是在受现代性思潮影响下的新时期之后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中，这一现状也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即使有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及其作品能够跻身于中国文学史的话语表述之内，得到主流话语的赞许或接纳，如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藏族作家饶阶巴桑、意西泽仁，彝族作家李乔，壮族作家陆地，维吾尔族作家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白族诗人白雪，锡伯族作家郭基南等。但这一赞许或接纳的话语逻辑并不是因其本体意义上的文学价值，而是出于文学之外的诸多因素，如政治话语层面的“多元一体”建构、“民族团结”需求或文化层面上地方性的民族民间文化展示等。在这里，“民族文学批评往往以寻求和阐释作品中的民族性、民俗风情为宗旨，通过凸显其异质性以更好地作为主流文学的点缀和补充”。^①因此，对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来说，能否被平等对待而不是以“照顾”心态“忝列”入中国文学史书写，并且使之作为一种“结构的历史”而不是以“板块的历史”而存在，从而取得进入公共空间的话语权，也就意味着身份的确证和文化的“拯救”。这一点也是学界积极倡导“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内在动力和价值诉求。

作为一种主动和自觉颠覆“沉默的大多数”状态后的话语重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旨在打破以往各少数民族文学多处于被静观、被误置状态的主体症候。所以，“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预设了理论探讨的两种话语规约：①强调以多民族文学史观去看待和审视“中国文学”范畴之内的“少数民族文学”；②强调“少数民族文学”理应进入“中国文学史”书写。上述问题又逻辑地引申出如下问题：其一，少数民族文学能否进入文学史；其二，少数民族文学如何才能进入文学史。只有对这些相关问题加以综合性或整体性探讨，才能真正明确多民族文学之于中国文学的意义，多民族文学史观之于中国文学史观的意义。

① 李长中：《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民族出版社，2013，第23页。

在笔者看来，传统的中国文学史只是一种“脱事件”的历史，是按照主流话语规范打造的历史，没有以多民族文学史观来看待和处理处于边缘或少数民族文学的事实存在。或者说，这样的文学史只是主流话语按照自身标准叙述或制造出来的文学史，是主流话语虚构出来并符合其实际需要的文学史。基于这一前提，中国文学史缺乏对“事件”的关注是言说“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基本逻辑推衍，如中国文学史“虽然冠以了‘中国之名’，但它们不能承担起中国——国别文学史的重任。因为，这些文学史的描述对象大都只囿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文学”。^①“传统‘中国’观念却使中国文学史研究成为汉族叙事视角下的文学流变史，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的文学或者被边缘化成为汉族文学的点缀和陪衬，或者干脆淡出文学史视野，成为纯民间的存在。”^②出于对国内各边缘民族文学“事件”性存在事实的集体性焦虑，学界一再从哲学基础、政治语境、历史演进、文学形态等方面探讨民族文学“能否”与“如何”入史的问题。

问题的吊诡是，即使是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探讨中，占我国少数民族总数达1/2强的28个“人口较少民族”的书面文学，却因其长期的边缘性存在而一再遭到主流话语的结构性放逐和忽视，“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概念也一直被遮蔽在“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叙述规约之内。尽管一些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如乌热尔图、郭基南、孟和博彦、乌·白辛等较早就进入了学界研究视野，一些中国文学史如张炯等主编的《中国文学通史》、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等，以及一些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简史如吴重阳编撰的《中国当代民族文学概观》、李鸿然撰写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特·赛音巴雅尔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等，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问题，甚至有的文学史还列专章（节）对部分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创作进行了论述。赫哲族作家乌·白辛，京族作家李英敏，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杜梅、涂志勇，鄂伦春族作家敖长福，乌孜别克族诗人塔来提·纳斯尔等，也一直是各族别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存在。不过，上

① 马绍玺：《怎样才能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的国别文学史》，《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② 李晓峰：《多民族文学：中国文学史观的缺失》，《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

述研究视野基本上只是将他们作为“少数民族作家”而视之，并没有以“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研究意识去呈现他们作为“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非规约性问题，也就难以从文学类型学角度认识到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自身特性。即使一些族别文学史或区域性文学史能够意识到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地位及意义，并在具体论述中资料爬梳扎实具体、论证严密可靠，亦不乏新鲜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甚至发前人所未发之言，如马克勋的《保安族文学》，马光星的《土族文学史》，武文的《裕固族文学研究》，以及冯国寅主编的《青海当代文学50年》，托娅、彩娜编著的《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李建平等的《广西文学50年》等著作。^①上述著作同样没有将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学加以比较性研究，这就难以充分认识“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何以能成为一种文学类型，与其他民族文学有何不同、缘何不同、不同之处何在等问题。作为当前学界有关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研究的唯一一部专著——钟进文主编的《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其在编写体例上也只是人口较少民族各族别文学的拼贴，在整体上属于教材性质，并没有真正表述出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类型学意义。由此而论，学界对“人口较少民族文学”进行的整体把握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直到目前仍是中国文学研究的盲点，不仅主流文学史研究未给予充分注意，而且在民族文学研究中亦较为薄弱，甚至付之阙如。

如果说，在新时期之前及之初，因“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尚处于孕育和成长期（或被遮蔽在主流话语规约之内而难以成为独立的文学形态）而不能真正影响到中国文学史书写的话，那么，新时期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已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学及文化现象之时，若持续保持对这一类型文学的忽视和冷落，将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中华多民族文学源头与形态的丰富性和多元化特征，制约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也可能导致“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这一本土原创性话语因缺失源自文学实践的支撑而成为脱离对象的言说，并最终影响人们对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与文化的理解与接受。故

① 王锐在《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创作与研究刍议》（《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第4期）一文中，对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研究现状也做了一些梳理，本书所用材料亦有引自该文之处，特此致谢！

此，本书研究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为新时期以来的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出于行文论述的方便，下文出现的“人口较少民族汉语文学”“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文学”等，皆是“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不同表述而已。

第一节 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与其书面文学的发生

文学是特定民族文化的审美表达，是该民族的文化信息与意义的主要载体，呈现或折射出特有的民族及地域文化色彩，浸润着特定民族的思维方式、民族性格、审美风尚、生产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变化规律等。我国 28 个人口较少民族之间在族源、地域文化、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书面文学发展历程及其叙事资源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各地区资源条件和发展的差距”^①等也都客观存在。这些都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到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们的文学审美创造并使之呈现出族别文学间的不同。当我们把诸如佤族作家群、达斡尔族作家群、裕固族作家群、景颇族作家群等加以比较性研究时，发现他们的作品在民族性的表达、现代性的阐释以及情感体验的表述等方面，确实存在着较大区别。但是，自新时期以来，由全球化及现代性所引发的一体化文化迅速向纵深推进，我国各人口较少民族日趋面临着几乎相似的多元文化混杂语境，基本一致的现代化发展需求，生产、生活方式急剧转型的现实处境和共有的因文化剧烈震荡而生成的身份认同压力等问题。或者说，正是由于共同面临着“现代性”所带来的诸多压力或困境，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才产生了几乎相同的心理体验和生活经验，他们的心理波动和情绪流动才具有“类”的特征，他们有关现代性背景下的人性书写才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再加上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大多有语言而无文字，丰富发达的民间口头传统至今仍作为一种“深层结构”影响或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言说习惯、道德伦理、审美取向及审美建构方式等。这就构成了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共性特征，而这一共性特征使得其文学不仅承担着多民族国家内文化多样性的传承、保护与发展等重任，而且使其题材选取、主题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1。

设置、情感体验、审美品格等方面亦呈现出基本的一致性。这是“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加以研究的基础,或者说,20世纪80年代之后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共性特征构成了“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基础。如钟进文先生所说:“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间在发展经历、族群意识、文化认同、民族感情等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深层情结在文学中就表现为叙述模式的高度一致性。”^①换句话说,当代中国各人口较少民族现代性生存境遇的一致性或相近性,各人口较少民族现代性体验及情感诉求的一致性或相近性,以及各人口较少民族共同面临的口语文化发达而书面文学历程较短、书写资源相对匮乏等问题,决定了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类型学特征及其研究的合法性。这一研究的合法性无疑也在彰显着一个潜在的话语症候,即“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作为黑格尔意义上的“这一个”不能被硬性纳入中国文学或汉民族文学的知识谱系之内,而是呈现出独具民族特色及地域特点的地方性知识特征和殊异性的文学现象。具体表现为如下特征。

其一,“人口较少”,生产生活方式相对单一,文化核心区域小,文化解体风险大,是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普遍存在的基本症候(尽管在现代性语境下,各人口较少民族内部的生产生活方式已发生很大变化,存在多种生产生活方式并存现象,单以鄂伦春族为例,其内部既有渔猎、采集、手工业等传统生产方式,同时也有农业、服务业、工业生产等现代生产方式存在。只不过就族群内部某一群体来说,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仍是较为单一的,如使鹿鄂温克人、渔猎赫哲人等)。在我国28个人口较少民族中,人口在万人以下的有塔吉克族、独龙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门巴族、珞巴族、高山族等;人口在5000人以下的有塔塔尔族、门巴族、珞巴族、高山族等。人口较少民族人们一般情况下对生存环境较为依赖,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如狩猎、渔猎、游牧、耕作等都需要特定的环境,与特定的生态环境之间形成一种息息相关的生活链条。他们能够感受源自大地深处的心跳与脉动,触摸山川、河流、森林久远的回声与性情,聆听风声、鸟声、涛声的宁静与安详,静观花生草长、日出月落的秘密与神奇。同时,这一特定生存区域也决定了他们的文化生态异

^① 钟进文:《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初探》,《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

常脆弱、文化造血功能相对不足，文化抗风险能力相对脆弱。也许对人口较多的民族来说，一棵树的砍伐、一片草的枯萎、一只鸟的死亡、一位老人的去世、一个民间故事的消失等，不会引起民族群体较大的心理波动和情绪化反应，但对人口较少民族群体来说，就有可能隐喻着一种文化的消失或一种生存之根的斩断。或者说，对于这些人口“少”、文化相对简单的民族来说，环境的破坏、文化的消解与社会秩序的解体之间在现代性语境下就有了相互间的勾连。费孝通先生曾将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间的小族群聚居地如撒拉族、土族、裕固族等称为“民族小岛”（“小岛”这一形象既具体、生动，又凸显出悲剧、风险的存在。这也是国外学界为何一再将这些人口较少、文化相对简单的民族称为“小民族”或“小小民族”的原因之一）。因为是“民族小岛”，在面临来自外来他者民族文化的强烈冲击时，其生存空间、文化传统等很难“独善其身”，很难按照其原有的发展逻辑演进，正如裕固族作家铁穆尔所说，一个尧熬尔^①老人的故去，一个尧熬尔古老习俗的流失，可能意味着尧熬尔的一段历史将被永远埋入地下，一首曾经传唱的尧熬尔民歌将永远消失，回归尧熬尔历史的路被阻断。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原本在相对静态、稳定的环境下孕育而成，一旦在现代化急剧变革中面临着超出其承载能力的他文化冲击及生态环境破坏，尤其是以追求商业化、娱乐化、市场化为宗旨的大众文化的日益进逼，就会严重影响人口较少民族传统文化的存续。

换句话说，对于文化传承人口相对较少的民族来说，在全球化加速不断向各边缘民族地区迅速播撒之时，这些边缘民族的文化更是一种边缘的“弱势文化”，其“被冲击、被重组、被改造”的现象就会愈演愈烈。甚至可以说，全球化冲击“不断表现在强弱文化之间的不对等影响，更表现为强文化对弱文化的‘强行交流’和‘文化覆盖’，这种‘强行交流’和‘文化覆盖’往往以‘强经济’为依托，对其它国家和地区传统的地方文化进行‘文化渗透’，改变甚至荡涤传统地方文化”。^②正是

① 另译作“尧乎尔”“尧敖尔”，裕固族人的自称。学术界对这一自称的译法并不统一，本书因而未对此词做统一处理。——笔者注

② 张鸿雁、房冠辛：《新型城镇化视野下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城市建设》，《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缘于他者文化对弱小民族文化的“强行”重组或改造，弱小民族的文化才难以保持在他们看来本应自成一体的民族文化系统。杜玉亭对基诺族的调查、张海育对土族学生的调研、兰州大学志愿者对裕固族儿童的调查、何群对东北“三少民族”的调查等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风险的存在。再以赫哲族为例，赫哲族具有鲜明的渔猎文化特征，其神话、传说、故事等都渗透着浓厚的渔猎文化特色。随着大规模资源开发，他们世居地区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渔业资源锐减，赫哲族文化面临失忆风险；而在布朗山乡，人们甚至认为：“我们的民族快不有（没有之意）了，已经快被汉化了。”^①目前，大多数布朗族青少年已不会讲本民族语言，也不知道本民族历史文化，更不愿意言说本民族语言，不愿意穿戴本民族传统服饰，不愿意过本民族传统节日。其他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也存在因其生产生活方式单一，文化承载人口较少、文化生态较为脆弱等原因而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文化解体”或与传统“断裂”的风险。

也就是说，当现代化进程势不可当、决绝地“收编”或同化这些无能为力或无可奈何的边缘区域之时，弱小民族单薄而根基不牢的文化生命很难“独善其身”，它们的传统文化现代转型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轻而易举、一蹴而就，“断裂”就成了其现代转型所潜隐着的必然代价。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就把人口较少民族的上述遭际概括为“经典性的‘断裂’意象”。他的《老人和鹿》《沃克和泌利格》《清晨点起一堆火》《猎犬》《越过克波河》《最后一次出猎》《在哪儿签上我的名》《玛鲁呀，玛鲁》《灰色驯鹿皮的夜晚》《萨满，我们的萨满》等作品几乎都是以“老人/传统”的无力或死亡表述着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性语境中的“断裂”问题。在乌热尔图看来，鄂温克族由于文化承载人口数量偏少，文化传承链条相对脆弱，很难经受住外来力量强烈而持续性的挤压，与传统的隔绝或断裂就成了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在当前语境下的必然命运。他为此解释说：“你的民族人口稀少，顽强地走了上千年的生命历程，一条牢固的文化和生命链条一代传给一代，递在你的手中突然变得脆弱。你被置身于两个世界，一个古朴而脆弱，一个斑斓而万变，你的两难选

^① 据郗春媛博士的田野调查，特此致谢！

择含有痛苦。”^① 传统文化的“古朴而脆弱”与现代文化的“斑斓而万变”构成了典型的难以共存、不可通约的紧张。在这一现代性转型过程中，鄂温克民族很难规避与文化传统间的“断裂”风险。更为可怕的是，面对着本民族文化日渐消解或陨灭的风险，长期被他者所代言的鄂温克民族却难以表述出自身的实际意愿和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这也是乌热尔图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一再强调“声音不可代替”的根源）。这一问题不能不唤醒作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代言人的作家们的文化忧患意识和自觉为自我民族代言的责任担当意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代言并非一种被自我赋权的代言，他们只是承担着整个族群声音的呈现者或执笔者功能。因为，“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他们的心声是一致的，他们的现代性体验是相同的，一如乌热尔图自己所说：“我的感情、我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内心是相通的，基本是一样的，所以说才有这种代言的资格。”^② 出于自觉的“代言”意识，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就以保存民族文化、记录民族生存历程为目的，从而使他们的文学文本先天性格上接续文化传统、重建民族身份的价值底蕴。乌热尔图在《我的写作道路》一文中指出：“作为一个人口稀少的、面对现代文明冲击的、古老民族的第一代作家，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力图用文学的形式记录和保留自己民族独特的文化，因为一些弱小和古老的民族文化时刻处于被动的、被淹没的文化困境之中。”^③ 在这里，乌热尔图无意识地连续使用“人口稀少”“面对现代文明冲击”“古老民族的”等词语来界定自己民族的身份，凸显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因为是“人口稀少”且是“古老的民族”，它们的文明形态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典型的脆弱性，在“现代文明冲击”面前也就很难规避被同化、被改造的风险。正是源于对民族传统文化已经或即将“断裂”或被“淹没”的忧虑，乌热尔图后期作品的主人公或叙述者几乎都是以“我们”“我们鄂温克人”“我们使鹿部落”等群体性指称进行文化身份叙事，隐喻着对已经或即将解体流失的鄂温克狩

① 转引自苏都热·华《母鹿—苏娃》，作家出版社，2000，第10页。

② 宝贵敏、巴义尔：《昨日的猎手——与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对话》，《中国民族》2007年第12期。

③ 这是乌热尔图先生于1986年10月30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专题讨论会上的发言。

猎文化的哀悼和沉思，为民族代言的自觉意识使他的文本叙述总是背负着“想象的共同体”意义上的文化重塑与价值担当意识。

作为新时期率先意识到“文化断裂”风险的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乌热尔图的创作主旨可以看作是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创作的一个标尺、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我们可以聆听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共同心声，可以触摸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在现代文明冲击面前灵魂跳动的脉搏；通过这面镜子，我们依然还可以看到，随着现代性在各边缘民族地区播撒的日益深入，当前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文化忧患意识以及其在文学文本中的表现程度也更为强烈。

其二，在现代性及全球化作为当前中国社会总体性或结构性的发展逻辑或价值规约面前，人口较少民族群体由传统所形塑的身份的连续性、历史性及自我确证性遭到严重削弱，身份归属、族群意识等问题成为当前人口较少民族群体现代性体验的主体症候，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日益彰显，全方位影响当代人口较少民族的书面文学创作，并使其文本呈现出强烈的文化寻根意识。尽管对目前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物质生活水平相对较低、文化事业发展相对薄弱的人口较少民族人们来说，现代化发展是他们最终融入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社会形态的现代化是不以他们自身的意念为转移的，更不能以保护传统为名而试图阻止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等的现代化转型。但是，作为一种后发外源性现代化，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化是在民族主体还没有完全认同和没有主动参与意愿的情况下借助自上而下的外在力量推动的，再加上“他们的文化处境比中国其他少数民族更为严峻”（武寅语），在传统观念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心态依然制约着人口较少民族“如何融入现代化进程”与“如何融入他者民族”这一时代主题，如文化保守主义问题、文化虚无主义问题、文化本质主义问题等，并使之以一种相对稳定的“维模功能”决定着他们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态度。“在文化传播中，维模功能使文化圈对外来文化起到一种选择和自我保护作用。如果外来文化对原有的文化模式具有危害或破坏性时，维模功能便会起到一种守门人的作用，竭力阻止破坏性文化的侵入。”^①“维模功能”的存在使得人口较

^① 沙莲香：《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第72~73页。

少数民族在面临诸多与其传统不相适应的外来文化碰撞时，很自然地会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形成“文化区隔”现象，进而影响到人们与其他民族的“社会融入”及其自身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的《一群羊走过县城》甚至把本民族群体比喻为“软弱”“纯洁”的“羊”，“县城”（“县城”或“街市”是当前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中最常用来隐喻他者的典型表征）则是“屠场”，“县城”里的人是“比狼更可怕的动物”。^①在这里，小民族群体对他者的恐惧或恐惧性想象所形成的“维模功能”在自我与他者间形成了一种截然对立的“文化区隔”。

一般来说，民族文化是与民族群体社会生存和生活发展相适应并不断随之而更新的，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化也需要它们的文化不断更新来适应之。或者说，任何民族的文化更新都有其自身独特的规律，既不能为之拔苗助长、好高骛远，也不能抱残守缺、故步自封，这是一个民族发展必须坚守的基本准则。只不过当源于强势话语的全球化及现代性以经济一体化和生活方式同质化等方式迅速改变着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传统之时，极有可能导致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出现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文化模式的变迁，并使之在潜移过程中与固有文化传统产生一系列尖锐矛盾和剧烈冲突，导致它们的文化不仅没能得以良性、健康、持续性发展，反而遭到系统性、结构性破坏，这是各小民族在现代性快速发展语境下时常出现的问题。费孝通对如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一些小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调研后认为：“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一些根蒂不深、人数又少的民族，本身还没有形成一个有生机的社区，不是自力更生的状态。”^②因为“根基不深”，因为没能形成“有机的社区”，因为人数较少，人口较少民族在全球化及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种既不能有效融入现代化发展轨道，又很难继续保持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的两难处境，甚至一些扶持性政策的实施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惑，反而生成更为令人担忧的后果，也由此生成诸多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等。例如，随着国家对鄂伦春族的政策性扶持和现代性文化的进入，鄂伦春族现在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问

① 鲁若迪基：《一群羊走过县城》，<http://www.qhnews.com/2011zt/system/2011/08/30/010454426.shtml>。

② 费孝通：《民族生存与发展》，《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